

← (上接 14 版)

间视角,能够理解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随着更多具有地理知识背景的学者加入,新的力量在边缘地带逐渐生长。

1、观察中国:口岸之于腹地与中国的涵义(1950's—1960's)。

1953年墨菲(Rhoads Murphey)的《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出版,表明口岸城市成为透析近代中国的一个窗口。1956年费正清(J. K. Fairbank)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从沿海条约口岸的外力冲击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初期的适应。1960年代后,“费正清模式”与“冲击—反应”概念的政治性思维取向受到了质疑。侯继明对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德恩伯格(Robert F. Dernberger)对于外资与口岸的解释,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从近代以来经济的全局,探讨口岸城市与内陆之间的关系。

2、识别中国:从口岸解释近代区域经济变迁(1970's—1990's)。

1960—1970年代,随着历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在刘翠溶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不再是把口岸城市简单地作为透视的窗口,首次对贸易进程、商品流通、市场结构、贸易影响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1973—1983年间,台湾学者对口岸贸易的研究一时蔚然成风,对相关口岸的贸易、贸易效用、腹地经济变迁等进行了新的研究。至此,已经大大超越了墨菲、侯继明、德恩伯格等一般的经验性认识。

因为中国的地方性变异幅度很大,1984年柯文提出需要提升中国研究的“精度”,即将中国“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其时,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的框架下,台湾“中研院”多位学者分别研究闽浙台、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广西等地区,试图探讨1860—1930年代中国各地在西方冲击后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过程,及其成败的原因。这一系列研究表明,学界已经超越了口岸与区域的一般性讨论,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对口岸贸易、区域变迁、传统商业关系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及至1990年代,大陆学者在近代口岸贸易和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在相关的水运与港口史、城市史方面,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大约在同时,台湾学界对近代口岸贸易、大区域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拓展。

20世纪下半叶的口岸贸易与近代中国研究,从空间与地理的角度切入,对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多维考察。但在同时,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历史经济或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讨论近代经济变革,暂时未能形成学科史上的突破,故而一度陷入困境。

## 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地理学“近代时段”

大约在1990—2010年代,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理念、方法工具被引入近代口岸与区域研究,具有历史、经济与地理知识背景的学者,将时间与空间分析相结合,开启了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

1、从口岸贸易转向经济地理(1990's—2006)。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1993)讨论了晚清以来国家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的影响,从核心、边缘等区域视角,观察了近代不同“区域”的塑造过程。戴鞍钢(1998)从上海港口建设历程、城市崛起、港口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变迁的影响、上海和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建构方面,关注港口、城市、腹地这三个密切相关的要素。大约同期,吴松弟(2004)认为近代“港口—腹地”格局及其引发的各区域现代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在《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中,吴松弟(2006)等从经济地理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现代经济的空间展开过程,总结了近代以来港口城市与腹地的空间演变。

就在地理学界对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搁置之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开启了“港口—腹地”及其空间形态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港口—腹地的双向经济联系、互动作用及其动力机制,从而将口岸贸易研究逐渐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

2、中国经济地理学的“近代时段”(2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态也迅速发生了巨变,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及其属性越来越令各界瞩目,学界在研究这一现象的同时,

不由地询问其长期演化的起源、路径与趋势。最近十多年来,学界相关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梯式的进程。

第一,有关口岸、腹地与区域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吴松弟、樊如森、王列辉、武强等人的著作,形成了一些相对规范的学术路径,对近代口岸的研究已超越了港口贸易本身和区域影响的一般分析,开始将历史、地理和其他研究思路进行整合,以构建融合时间、空间诸要素的分析框架,更多地触及到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第二,有关劳动地域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新产业空间的研究,以及网络经济、区域集聚与集群、干预与管制、文化与经济关联方面的研究,同样正在被有效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之中。例如,有王哲、吴松弟、Keller W. Li B.、Shiue C. H.、王茂军及笔者等对近代贸易网络与结构、空间组织、空间经济增长的研究,采用近代中国旧海关等面板数据,尝试分析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些高频问题,验证了相关议题在近代时期的特征与表现,类似于格雷戈(Derek Gregory)对约克郡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地理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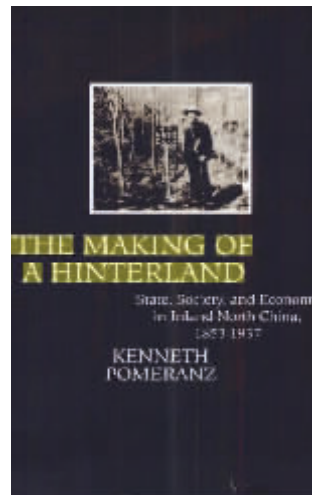
第三,随着相关的文献、工具、方法积累的初步完成,学界开始探索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地理的格局、特征与内涵,最终形成了九卷本“近代中国经济地理”(1840—1949年)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017年),分为绪论与全国概况卷、江浙沪卷、华中卷、西南卷、华南卷、闽台卷、华北与蒙古高原卷、西北卷、东北卷。其中第一卷以全国为整体获取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线索,并纵向分析各部门经济地理,其余8卷分别以一个大区为对象,探索各大区域近代经济地理的特征与差异性,“1+8”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总论与分论系列。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史上看,该丛书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经济地理进行完整全面的分析,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弥补了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近代时段”学术研究空白,将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近代时段”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起点。

## 学科史上的意义与期待

我们知道,在经济地理学



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从沿海条约口岸的外力冲击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初期的适应。



彭慕兰在《腹地的构建》一书中,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对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的萌芽时期强调其知识积累的历史性,正是通过自身的历史来建立这一学科,但是,随着空间分析与区域科学的进一步融合,学者们愈来愈重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面向,却又忽视了时间与制度的面向,近年来虽已经增强了对制度与文化的关注,但时间维度的缺失依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史并非是范式的演替,而是一个核心经验的发展,即以不同的尺度来解释空间经济,使得人们对于其时的环境、生活以及不同类型现象之间的联系与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思里夫特(N. J. Thrift)、奥尔兹(K. Olds)倡导从社会的多元性方面,从真实世界的角度重塑“经济地理学”的边界,实为睿智之见。陆玉麒从人文地理学科学化的总体目标与实现路径角度,提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历史过程的长时段分析方法。李小建也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同一阶段不同类型的经济地理研究。从樊杰等梳理的近30年来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演化来看,已经逐渐遵从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回归追溯“经济地理学”发展史的谱系。

当前是新经济地理学发

展的时代,它能够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例如,可以测度与分析我国第二次融入全球化时代很多具有经济地理特征的集聚与扩散现象的效用及其成因。如果说这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领地,那么在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经济地理学的旧领地又在哪里?从上述的学术维新史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界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其基本研究方法和路径,也完全可以运用于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也完全可以移植到近代时期来进行验证,比如,近代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测度、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及机制等。随着近些年大量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大比例尺地图(尤其是日军和美军军用地图)的发现、整理和出版,进行小尺度的城市内部经济地理或城市地理研究的条件也越发具备,有助于从长时段的角度厘清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地理的演化路径。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研究的复兴,将能提供一系列更为清晰、准确、完整的经济地理变迁案例,将能寻找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地理变迁的历史脉络。从“近代时段”的研究中可以探索源自中国历史基因上的特色之处,从时间与演化的维度上丰富并发展中国经济地理学。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